

教育部“十五”“211工程”辽宁大学“东北边疆与民族”子项目丛书

红山文化研究

HONGSANWENHUAYANJIU

张星德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红山文化研究

张星德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山文化研究/张星德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12

(教育部“十五”“211”工程辽宁大学“东北边疆与民族”子项目丛书)

ISBN 7 - 5004 - 5330 - 2

I. 红… II. ①张…②齐… III. 红山文化 - 研究
IV. K871.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9295 号

责任编辑 李树琦
责任校对 李云丽
封面设计 诚信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010 - 64031534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980 1/16

印 张 14.625 插 页 2

字 数 345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教育部、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辽宁大学 211 工程项目

凝炼方向 凝聚队伍 凝结成果

——国家教育部“十五”“211”工程辽宁大学
“东北边疆与民族”子项目丛书总序

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原辽宁大学历史系）由于其历史学科具有较深厚的历史积淀和较雄厚的现实研究实力，在国家教育部“九五”、“十五”、“211”工程建设过程中，皆被列为重点建设学科。在“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过程中，我们始终思考着这样一些问题：我们的重点学科方向即学术立足点主要在哪里？我们怎样围绕主要学术方向设立项目、组织队伍、开展研究？等等。现在，辽宁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东北边疆与民族”项目丛书即将出版了，我们的思考也有了初步的结果。在此，特以此序述其缘由。

中国东北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进程，形成了相对独立和稳定的区域单元，成为中华文明中的一个独特的区域文明。其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地域辽阔。

作为祖国的边疆地区，东北地区陆地与俄罗斯、蒙古、朝鲜等国接壤，有数千里的边界线；隔海与韩国、日本相望，亦有数千里海岸线。因此，边疆问题是东北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东北地区的古代文明作为中华文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兴起和发展过程中，曾呈现出辉煌灿烂的文明成果。新乐文化、红山文化等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源头之一。

东北又是中国众多民族的兴起和发展之地。特别是自10世纪以迄近代，随着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的陆续兴起，继而挺进中原，建立了辽、金、元、清诸王朝，对我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

自近代以来，东北地区亦成为列强争夺的重点地区，在这个阶段，既有张氏父子奉系军阀的统治与列强争夺中的自强，也有东北十四年的沦陷史，更有东北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的英雄事迹。

总之，在中国东北这块古老土地上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不仅是东北地

方性的事件，更是全国性事件。因此，在这种意义上，研究东北问题就不仅仅是地方性问题，也是全国性课题，甚至是世界性课题。其中，边疆与民族问题，又是其中重中之重的课题。

边疆与民族所涉猎的课题极广，从东北民族的起源，到东北疆域的形成沿革，再到东北区域文化与中华主体文化互动关系的研究，从近代东北地区的开埠到移民，再到东北城市进程，以及近代以来东北社会风俗习惯变迁的研究；从跨界民族问题、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原生语言问题，再到东北历史上地方民族政权的民族政策及汉化政策研究；以及近代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与掠夺等等，都可以囊括其中。这些问题不单单是东北地区本身的研究课题，也是中国历史整体发展进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研究课题。

辽宁大学地处东北，占据地缘优势和资料上的便利条件。因此，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许多前辈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对有关边疆与民族问题的开发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先后出版了有关东北边疆与民族的研究著作数十种，发表论文数百篇，承担研究国家及省部级项目数十项。其中，在全国产生重大学术影响的就有范文澜《中国通史》中的清史卷、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中的清史卷及《清代全史》第9卷、李燕光教授的《东北地方史》及《清代东北史》、宁梦辰教授的《东北地方史》、董守义教授主持的《辽河文化丛书》（12卷）、胡玉海教授主持的《奉系军阀全书》（6卷）等等。此外，由我院教师编校出版的《清初史料丛刊》在全国得到普遍认可，在清史研究资料工作上做了开创性工作；李林教授的《满族家谱研究》等，对满族的族源演变进行了实证性的开拓研究；孙文良教授主编的《满族大辞典》从整体上对满族族源、语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进行学术的界定，奠定了满学研究的基础条件。历史文化学院还曾主办过全国第二届和第七届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在东北近现代史的研究上，孙克复教授、关捷教授等对于甲午战争的研究，张德良教授、陈崇桥教授、周毅教授、胡玉海教授、马尚斌教授等对于奉系军阀及东北军史的研究，皆取得了显著成绩。出版了《明清战争史略》、《中国近代军事史》《甲午海战史》、《甲午陆战史》、《奉系纵横》、《奉系军事》、《奉系经济》、《奉系教育》、《奉系外交》等著作。由上述学者进行的开拓性研究，为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东北地方史研究领域的更加深入、更加全面的发展奠定了学术基础，并形成了良好的学术传统。

上述所列研究工作，在全国学术界皆有口碑。与上述相对应，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还组建了相应的学术研究机构，并在人才集聚、梯队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们早在1958年就已组建了清史研究室；1978年全国史学研究规

划会议上，将辽宁大学定为全国清史研究中心、辽金史研究中心。1966年辽宁大学成立了东北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并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多次承担有关部门课题。在2002年国家适时启动的“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作”项目中，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以其实力又获得多项课题立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关研究成果，对于史学研究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决策参考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通过多年的建设，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已经形成了研究方向稳定且有特色，研究队伍整齐，年龄结构合理，研究经费相对充足，学术地位日渐提高的趋势。业已形成了东北边疆与民族研究、东北社会与民俗文化研究、东北政治与对外关系研究等三大方向。并形成了以任爽、张杰、焦润明、胡玉海、韩世明等17名教授、20名博士为骨干的稳定的研究队伍。为学科建设奠定了学术上的和人才上的基础。

就全国而言，学术应有分工。合则成一整体；分则各有特色。应该说，经过数十年凝练的“东北边疆与民族”研究领域，较好地体现了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东北地方史研究的地域特色和学科优势。同时，在这一领域中，我们充分考虑了与全国，特别是东北地区史学同行的分工与合作问题，我们将重点放在具有辽海地区地域特点之红山文化为代表的早期人类文明、唐宋以来东北史（重点是唐史、辽金史、清前及满族史、奉系与张氏父子研究等）等。

在以上背景之下，在国家教育部“十五”“211”工程建设中，“东北边疆与民族”被列为辽宁大学重点建设子项目。

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辽宁大学“十五”“211”工程“东北边疆与民族”子项目成果丛书陆续出版了。愿它们能为中国史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愿包括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内的中国高等学校历史学科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史学之树常青！

辽宁大学“十五”“211”“东北边疆与民族”

子项目领导小组 组长 丁海斌

2004年7月7日

序

郭大顺

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辽宁西部山区的东山咀和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祭坛、女神庙、积石冢以及以龙形玉为代表的玉器群以来，红山文化如异军突起，由一支长期被视为受中原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边远地区的史前文化，一跃而成为史前文化研究的一个重点。在社会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且持续二十多年而不衰。但相对于社会影响而言，有关红山文化的研究和成果发表不多，多少有点社会热而学界冷的现象。所以，当我看到张星德同志的《红山文化研究》一书时，十分高兴。

星德于北京大学考古系本科毕业后分配到辽宁省博物馆工作。期间，正赶上参加牛河梁遗址的发掘。正如她在自序中所言，她有幸亲身经历了那段不寻常的发现过程。她亲手发掘过第二地点1号冢第14号墓，体会过玉器出土时的喜悦心情，也参加过女神庙的发掘。还曾经护卫着女神头像驱车从工地赶到兴城请正在那里疗养的苏秉琦先生观摩研究，并聆听了苏先生关于《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和大课题》的著名学术报告。她在吉林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在张忠培先生指导下撰写的毕业论文《论红山文化的分期》，当时在材料较为零散的情况下，尽量收集有共存关系的典型单位和典型文化因素进行比较，由于方法得当，结论较为可靠，是目前有关红山文化分期的较为可信的论著之一。而这段难得的学习经历，也为她到辽宁大学执教以后的教学工作和对红山文化的继续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红山文化研究》一书，在资料收集方面较为全面，而且注意介绍各种观点，包括不同观点，这是十分可贵的。所发表的自己的研究成果，也有不少新意。如关于红山文化分期，作者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又补充了不少新材料，结论也有深入；在红山文化与周围诸文化的关系方面，她也下了很大工夫进行比较研究，其中如提出红山文化与赵宝沟文化不是前后继承关系，而是时间大体平行互有影响的关系，又如红山文化与小河沿文化的关系，在将小河沿文化划分类型的前提下进行比较，认为红山文化的

后续也不是一条线的简单继承关系。关于红山文化与内蒙古中南部庙子沟文化的关系，作者也提出不是小河沿文化对庙子沟文化单方面的影响，而是在小河沿文化形成过程中，庙子沟文化也是其中的一个来源等。这些观点，都论述有据。

关于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及有关的宗教祭祀的研究，是本书的一个重点。有关史前祭祀方面的研究，一直是我国史前考古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自从红山文化大规模祭祀遗址和其他地区有关发现以后，这方面的研究开展较快。作者在书中仔细分析了牛河梁遗址发现的有关当时人类举行祭祀活动遗迹与大地的密切关系，提出红山文化女神像首先是土地神，继而注意到女神庙在牛河梁遗址群的中心地位，提出由土地神演变为至上神以及土地神与祖先神的关系。并以此作为探索当时社会变革的主要依据。书中还引用了国外这方面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仍然不足的情况下，作者能从多角度进行比较分析，并旁征博引，实属不易。

这里要特别回顾一下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引起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这是红山文化引起广泛重视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引起争议较多的一个问题。二十年过去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仍方兴未艾，认真回顾和总结，可以少走弯路。记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我们开始将红山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联系起来考虑问题时，当时的主要依据，一是东山咀遗址南圆北方左右对称的建筑布局，一是玉器的高度规范化和龙形玉器的出现，前者已有中国古代建筑布局的传统思想，后者则已受固定思维的制约，这些都已不是原始氏族社会所能拥有的，而应该是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在思想观念上的反映。通常以城市的形成、金属铜的发明和文字的出现这三要素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准，已不能解释这些新的发现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和观念，于是我们当时提出了一个“原始文明”的概念。在这方面，苏秉琦先生有更为深入的考虑。早在1985年，苏先生就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认为应把“古城古国与史前文化联系起来”来理解红山文化出现的这些新因素，更把这一概念作为指导田野考古实践的一个中心环节，即把寻找高层次的中心遗址作为田野工作的重点。我和同事们曾多次议论过如何理解古文化古城古国提出的学术意义。有学者对此有切身体会，他们说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各地都发现了一批距今四五千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心遗址和高等级遗迹与遗物，对它们代表什么社会发展阶段，一时有些迷茫，“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在这时提出，起到了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并将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引向深入，所以古文化古城

古国的观点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一样，也是中国考古学理论的组成部分。苏先生还在东山咀、牛河梁遗址发现后，将坛庙冢与古代帝王的祭祀礼仪联系起来，说牛河梁遗址的发现“丰富了我们对当年在这一带几百平方公里内存在的大建筑群的社会历史意义的认识”。“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它们之间的广阔地带没有发现过和它们属于同一时期的古遗址和墓群，却连续发现过相当殷周之际的青铜器群窖藏达六处之多。我们有理由推测，这里还有可能发现与窖藏同一时期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建筑物或建筑群遗迹。这里的‘坛’（东山咀）、‘庙’（牛河梁）、‘冢’（积石冢）和窖藏坑，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四组有机联系着的建筑群体和活动遗迹？远在距今5000年到3000年间，生活在大凌河上游广大地域的人们，是否曾经利用它们举行重大的仪式，即类似古人传说的‘郊’、‘燎’、‘禘’等祭祀活动？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他还提出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碰撞，是红山文化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这些都已涉及中国文明起源的机制、道路与特点问题了。《红山文化研究》一书，在论述红山文化的社会变革时，遵循着“古文化古城古国”的理论，同时对文明起源所涉及的一些理论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尤其是书中通过筒形器使用的变化，与古史“绝地天通”的记载相联系，有一定道理。

近年，牛河梁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又不断有新的进展，周围地区也不断有新的发现。这些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西辽河流域在史前时期确有较为进步的史前文化，它们既有鲜明的区域特点，又有较强的连续性，并在史前时期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个重点地区。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开展，红山文化也会引起更多的重视，《红山文化研究》在此时出版，相信会有助于这方面研究的深入。

自序

——我的红山情结

距今六七千年前，在黄河两岸一望无际的黄土平原和高原上，有许多氏族村落星罗棋布地分布在河流沿岸高亢而平坦的地方。这里土地肥沃，又靠近河水，农业和畜牧业都比较发达。森林中生活着各种成群的野兽，河流中浮游着无数的鱼虾，这里的原始居民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其中最具有特色的是他们用细黏土制作出陶器，然后又以各种色彩描绘于其表面，使之成为绚烂非凡的彩陶。彩陶的图案中既有几何形线条组成的花纹，比如三角纹、涡纹、圆点纹，变化繁复；还有写生的动物形纹样，奔跑的野鹿、飞翔的野鸟、张口露齿的大鱼、匍匐或跳跃的青蛙，生动活泼，栩栩如生。这里就是古书中记载的华夏人和东夷人居住的地方，考古学上称之为仰韶文化和后冈一期文化。

西辽河流域也是人类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新石器时代早期居住着被称为兴隆洼文化的居民。这里属于动物生态地理中的温带森林动物群和森林草原动物群的范围，有着丰富的动物和植物果实资源，所以这里的人们以狩猎、渔猎和采集为主要谋生手段。农业尚未发生或即使已经出现，但还远远显示不出它的重要性。与黄河流域的居民相比，他们的物质生活不那么丰富，他们使用着简单而粗糙的夹砂陶器，石器工具也不像黄河流域居民的同类器那样打磨精细，但精神生活却非常活跃，与黄河流域地区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形态构成了鲜明的差别。

在距今大约 6500 年左右，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居民中的一支——后冈一期文化的居民北进，打破了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居民以往生活中的平静，今天的我们还无法清楚地知道这两支不同文化传统的居民采用的是怎样一种方式进行着接触的，但是我们看到了接触引起的结果。兴隆洼居民学到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制陶工艺，他们的文化面貌发生了飞跃性的进步。这之后我们看到的先民留在西辽河流域的遗存，除了对当地传统文化继承、发展的一面外，又出现了许多新的融合了黄河流域文化因素的东

西。考古学家将之称为红山文化。之所以这样叫，是因为这类遗存最早被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的红山后遗址。

红山后遗址是1935年由日本人主持发掘的，之后他们出版了一本厚厚的报告《赤峰红山后》，把这种遗存称为赤峰第二期文化。“红山文化”这个名字是1954年才定名的。

《赤峰红山后》的影响是长远的。由于发现的遗存内涵一直未能超出红山后的范畴，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红山文化还被认为是一种受到黄河流域文化强烈影响的边远地区的原始文化，是牛河梁、东山咀遗址的发现才改变了这一现实。

在辽宁省凌源县和建平县交界的地方，有一处东西走向、绵延十余里的山梁地带，因牯牛河源出山梁东麓而得名——牛河梁。这里曾经像辽西其他地方一样，干旱、贫瘠、默默无闻。山梁的两侧满布松林，低矮的农舍错落其间。在这片土地上，并没有任何迹象引发人们对这里曾经有过一个复杂的原始文明的遐想，尽管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日本人在这里修筑铁路起，当地的村民就不时地从地下挖出一些“活石头”、绘有彩色图案的陶片和一些晶莹剔透的玉器。是啊，几千年的时间是很长很长的，俗话说沧海桑田，几千年风沙过处，一切的遗迹都早已被尘土淹没了，零星的几件物品怎么能让这些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个地方的质朴、勤劳的农民了解它们的意义呢？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1年初夏。在建平县开办的辽宁省文物干部培训班刚刚结束，凌源县富山乡的一位文物干部在村里一个农民的家中发现了一个玉箍，便问其来自何处，那农民答道：“从山上大石堆里拣的。”了解到这一消息的辽宁省博物馆考古队在郭大顺先生的带领下，很快来到山梁前一个小山村——马家沟屯。

低矮的房屋前围着窄小的院落，一座连着一座。清晨，村民们照例在自家房前屋后忙碌着，妇女们在灶边开始准备早饭，整个村子在袅袅炊烟中显得那样恬静、平和，只有偶尔从村前公路上疾驶而过的车辆给这宁静的山乡带来些许流动的快节奏。考古队员的到来使这里变得热闹起来，淳朴的农民得知客人的来意后，纷纷聚集而来，贡献出了他们保存经年的珍品，那里面有勾云形玉佩、马蹄形玉箍、双联玉璧等等。根据村民提供的线索，考古队员来到这些玉器的出土地——牛河梁的一个山岗上。经过简单采掘，一座石棺墓呈现在大家面前，由于墓上有很多石块堆积着，结构复杂，与一般的石棺墓不同，经考证，很快地，一处红山文化墓地——积

石冢被确认了。沉睡了 5000 多年的红山文化遗址群开始被发现了。

直到此时，红山文化的墓葬还是第一次被确认，更何况是东西百余米的积石冢，这怎能不令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然而同年，与牛河梁遗址相邻的另一处红山文化重要遗址——东山咀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一时又把人们的视线从这里引开了。

东山咀遗址在辽宁省喀左县大城子镇东南大约 4 公里的大凌河西岸，它的东、西、北三面被一长弧形黄土山梁环抱，遗址就坐落在山梁正中一个平缓突起的台地上，大凌河从山咀下奔腾而过，有名的马架子山和大山山口隔河与其遥遥相对，中间则是一望无际的大凌河河川。这里发现了一处大型的红山文化建筑基址。整个基址分中心、两翼和前后两端几个部分。中间是一座大型方形建筑，长 11.8 米，宽 9.5 米，四边用石块砌墙，其内为平整的坚硬黄土地面，地面上有用长条石组成的椭圆形石堆。方形基址南面大约 15 米处，有一个用石块铺砌的圆形台址。两翼建筑位于北部方形基址的两侧，分南北两部分，北部两翼为两道南北走向的石墙基，南部两翼为零散的石堆。东山咀遗址中除了出土有红山文化石器、陶器、玉器外，还出土了包括 2 件小型孕妇像和相当于真人二分之一的大型盘膝正坐人像的腿部残块在内的陶塑人像。

东山咀遗址一经发现，立即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这是因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的妇女塑像及与其有关的礼拜神祀遗址在国外早有发现。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中国的考古学家就开始企盼着在中国也能找到这样的东西。三十多年了，这个愿望终于在边远的辽西出人意料地实现了！随着东山咀遗址座谈会在朝阳召开，一处红山文化祭祀遗址被确认了。

但是，东山咀遗址地处狭窄的山梁正中，在偌大的红山文化分布区域中，会不会有更大、更完整的祭祀遗址呢？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指出：喀左东山咀祭祀遗址绝不是孤立现象，对于绵亘喀左、凌源、建平三县交界地区的遗址、遗迹极需进一步探明它们的全貌。同时对于和它们邻近的相应时期的遗迹遗物，也有必要进行探查摸底工作。对于牛河梁积石冢的清理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1983 年 10 月，对牛河梁积石冢的正式发掘开始了。辽宁省文物考古队再一次驻进了富山乡马家沟屯，沿着公路的工地边缘被围上了铁丝网，这个以往从来不曾引起人们兴趣的地方终于吸引了不少好奇的目光。附近村民要到这里看个究竟自不必说，公路上坐在大小车辆里来往的乘客也不

时对这儿多看上几眼，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平板仪、罗盘、图纸和考古队员专用的小铲、刷子一起搬到了工地。测量、绘图，然后揭去了积石冢上的近代土层，浑圆的大石丘终于暴露了出来。到处都是严重风化了了的碎石。为了慎重起见，考古队函请考古学家郭大顺、孙守道先生亲临现场指挥发掘。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已经是10月末了，树叶在疾风中纷纷凋落了，一阵阵寒风吹过，经霜的叶子猝然脱离树枝，像一群飞鸟一般在风中旋转飞舞，然后飘然落地，这阵阵的沙沙声仿佛在悄悄地告诉人们，冬天快要到了。这意味着一年中考古发掘的黄金季节即将结束，野外工地就要收工，一切似乎只有等到来年了。

然而，就在这一时刻，一个出人意料的重大发现出现了，它不在考古队员翘首以待的积石冢，而出自积石冢以北、牛河梁主梁北山上。

一天清晨，考古队员沿着山坡往后山林区散步，当来到凌源至建平旧公路南侧的凌源大杖子林区内地时，一位同志偶然发现在一个水冲沟里，有一块直径20厘米左右的馒头形焙烧过的红色土块，他拾起来问孙守道“这是什么器物？”大家争相传看着，孙守道经过仔细审视后说：“像女人的乳房。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饭后，考古队员找到林区的工人们了解情况。据工人们介绍，自解放初起人们在山上植树时就经常会刨出一些用火烧过的泥人胳膊、大腿等，当时人们认为没什么用又挺结实，就将这些大泥块垒到坝界子里了。根据工人们反映的情况，考古队员从坝界子里取回了一部分人像残块，又细心地将这些大小、形状各异的残块集中起来，经过仔细辨认、摆放，一个包括颈部以下各个部位的陶塑女神像显现出来了。而她的头又在哪里呢？

1983年10月31日，清晨。树林丛中万籁俱静，只听到小铲挖土的声音，原来是考古队员一清早就来到了这里，他们正在聚精会神地对前一天新发现的一堆红烧土遗迹进行解剖。小铲与泥土接触发出的每一声响动，都扣动着考古队员的心弦。终于在下午四点，剥开上面的红烧土后，一个活生生的女神头像出现在人们面前。女神额部宽而隆起，两颊丰满，高颧骨，圆鼻头，眼眶里被深深地嵌以圆形玉片为睛，显得格外有神，嘴角上翘，唇肌似掀动，仿佛微笑欲语，和善中带着威严，使每一个面对着她的人不由得肃然起敬。女神仰面而卧，神态安详又富于表情，似乎早在这里等待着后人来找到她，倒是发现者们被这艺术水平极高的史前女神的突然降临所震惊。面对这很久以来考古学家就梦寐以求的东西，今天得以相见

怎么能不令考古队员感到无比光荣？他们第一次面对面地看到了用黄土塑造的5000年前的祖先的形象，确切地说是来到了这位5000年前被千百人、甚至上万人景仰、祭拜的神的面前。圣像被埋藏了5000多年终于破土而出，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不久前还几乎不为人知的世界，所有的人都被她深深地吸引住了。大家一齐围了上来，摄影师及时抓拍了这一珍贵的镜头，此照片以《五千年后的历史性会面》为题，在此后不久举行的一次旅游摄影展上，赢得了展出二等奖。

紧接着，考古队员对这一地区进行了试掘，因为遗址被埋在离地表并不很深的地方，所以挖了不长时间，在距离现在的地面不足半米深的地方，一座占地面积大约150平方米的史前建筑就被发现了，并且很快地它的平面结构也被弄清楚了。它是一个南北长达18.4米，宽约6.9米的多室和一个长6米，宽2.65米的单室两组建筑组成的，其中多室包括有一个主室和几个相连的侧室。

之后的两年里，考古队员先后对多室中主室的两侧及单室西侧进行了解剖。残破的墙壁、崩塌的屋顶、人物及动物雕像的碎块填满了整幢建筑，人们小心地用小铲子挖着，不时地用刷子清扫着尘土，建筑的结构基本清楚了。这是一种被考古工作者称为半地穴式的建筑，在遥远得不复为人们记忆的远古时代，半地穴式是古人们经常采用的房屋建筑形式。他们在建造这处房屋时，首先由地面向下挖一个大坑，坑底就作为房屋的地面，坑壁则经过一番修整，先紧贴土坑壁直立5—10厘米的原木为骨架，结扎禾草秸把，再敷厚3—4厘米的底泥，然后抹2—3层细泥，这样，墙壁就基本建成了。在墙壁上，古人用工具拍打上条纹、窝点等纹饰，这一方面可以起加固作用，一方面又增加了房屋的美观。更有甚者，他们还在墙壁上绘出了美丽的彩色图案，比如赭红色的勾连纹、赭红色与黄白色交错的三角纹。尽管历经数千年，壁画的色彩已不再如当初那样的鲜艳夺目，然而其当时之高贵美丽依然可想而知。与同时期普通村落遗址中的那些窄小、低矮、没有任何装饰的简单住房相比，这座面积宽大、结构复杂、装潢优美的房子在当时一定是极尽富丽堂皇了。

发掘中，人物和动物雕像的出土是最令人兴奋的事了。发掘者是何其小心啊，惟恐损坏了那些原已破碎了的碎块，因为这是人们了解这座建筑性质的钥匙。他们极为小心地用小竹签、小毛刷刷剖着与泥土粘结在一起的一块块雕塑残块，还常常需要用石膏加固后才能提取，所以修复技师们总是要紧随其后，随时准备着黏接、复原，从北京请来的专家也不辞辛苦

亲临现场，准备应付不测。他们知道发掘古代遗存的同时，又是对遗存进行可能性破坏的过程，必须做到发掘与保护同步进行，否则一旦损坏了，它将永远无法弥补。这不是耸人听闻，这样的例子在考古发掘中并不少见。有一本叫做《研究过去》的书（Leonard Wooleg 著）介绍了罗马一位古物收藏家奥古斯托·詹多罗叙述的他亲身经历的故事。他小的时候曾同父亲一道打开一具伊特拉斯坎的古石棺，他说：“搬开那棺盖是很不容易的，最后我们把它直立起来，然后让它沉重地倒向一边。随后看到的情景我是绝不会忘记的，而且无论何时只要想起来就如在眼前：棺内是一个全副甲冑的青年武士的尸体，头盔、长矛、盾牌和胫甲俱全。注意：我看到的不是一具骷髅，而是一具四肢完整的尸体直挺挺地躺在那里，像刚刚放进坟墓的样子。然而这副模样只存留了一刹那。在火炬照耀下，一切都像是立刻化掉了，头盔滚向右侧，护心镜塌陷了，随之那圆形的盾牌就落到里面去，两块胫甲也突然落地，一块向左，一块向右。这具古尸完好地保存了多少世纪，一见空气就化掉了。……火炬光里看见一阵金黄色的烟尘悬在空中。”詹多罗记录的这具石棺里的死者属于那神秘的伊特拉斯坎民族，这个民族的源起和后裔至今还没弄清楚，然而发现这具古尸的人也只得及看了一眼，它就从此消失，而且再也无法修复了。

经过细心挖掘，考古工作者已经发现了分别属于五六个个体的女神塑像残块，她们的形体有大小之分，年龄有老少之别，或张臂伸手，或曲肘握拳，组成了多姿多彩、栩栩如生的女神群像。同时，还发现了附属于人像的、被神化了的动物形象；如猪龙和大禽的残块。

此后，考古工作者的足迹踏遍了牛河梁周围的山山水水，在方圆 50 平方公里的起伏多变的山头上发现遗址 20 多处，它们遵循南北轴线对称布局，以女神庙为中心，讲求高低主次，相互照应，形成了一个远离住地而专门营建的、规模宏大的祭祀场所，远远超出了以一个家庭为单位、在生活住房内设祭的家庭祭祀，也远远超出了以氏族为单位、以设在村落内部的“大房子”为祭祀场所的氏族祭祀。其规模之巨大，绝非一个氏族甚至一个部落所拥有，而是更大的文化共同体的祭祀圣地。

1986 年 8 月，中国第六次考古学年会在沈阳召开。会后，几乎所有的知名考古学家云集牛河梁，各大报刊争相报道，红山文化成为举世瞩目、闻名遐迩的古代文化。

笔者 1984 年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分配到辽宁省博物馆工作后即荣幸地加入了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掘队伍，亲身经历了红山文化玉器墓

的发掘、玉器的发现和女神庙的揭露过程，亲耳聆听了苏秉琦、孙守道、郭大顺等先生对红山文化的分析，一个谜一样的世界渐渐地展开在面前。冰冷的石头、无声的玉器、陶器逐渐变得生动，朦胧的古代人类生活场景逐渐显得清晰，一个刚刚迈出校门的学生真实地从实践中体会到了考古的意义，感受到了考古的乐趣。1986年，我又进入吉林大学师从张忠培教授攻读硕士，系统地学习了如何运用科学的方法认识、研究考古学资料，并在张先生的谆谆教诲下，完成了毕业论文《红山文化分期研究》。对红山文化的发掘、认识与研究，伴随着我的成长，同时一个心愿一直埋藏在我的心里，那就是把我认识的红山文化写出来，把它介绍给更多的人。2002年以来，我陆续承担了教育部、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及辽宁大学211工程关于红山文化项目的研究，在齐伟同学的帮助下，共同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

张星德